

□且惊且险

利鲛在喉



这是块剥猪排时震下来的碎骨,长3厘米。它前半部分呈30°锐角,边缘粗糙;后半部分是1.7厘米×1.1厘米的矩形,矩形上面那个钝角稍圆。整块骨头看起来像把缩小版的军刀,也像一只迷你穿山甲。

它原本是带少许肉的,炖着炖着那肉就烂在锅里了。那个上午家里来了客人,我翻翻冰箱,没什么菜。看看外面的毒太阳,我打消了出门买菜的念头。午饭时分,我打电话给一家排档,让送几个菜来,其中就有一份糖醋排骨。这军刀状的碎骨就是糖醋排骨中的一分子。

糖醋排骨味道不错,我们边吃边夸。吃剩的三分之一,我舍不得倒掉,就放到冰箱里。

第二天,我睡了个懒觉。起床后,我把剩余的排骨和南瓜一起炖了,那顿早饭我9点5分才开吃。因为饿了,也因为这排骨南瓜特别鲜美,我有点狼吞虎咽。

危险是这样降临的:我夹起一块南瓜,压根儿没想到,那块阴险的骨头就躲在这块南瓜后面。我毫无戒备地把它们塞到嘴里,因为太烫,舌头受不了,我就囫圇吞了下去——这是我一个非常坏的习惯,总以为把食物吐出来的样子很脏很难看。

这枚骨片就鲛在我喉咙里了。我感觉到它的大,感觉到嗓子眼的痛。我挖着喉咙,想把它弄出来,可是不行。于是我冒着三伏天的高温,忍着喉咙的极度不适,徒步往离家最近的社区医院跑去。

原以为,被鱼刺、肉骨卡喉,处理起来很简单。我童年时曾被一根鱼刺卡喉,我爸拿一双筷子当压舌板,让我“啊……”他将另一双筷子伸进我的嘴巴,把那根鱼刺夹出来了。

可是社区医院的医生一口把我给回绝了,理由很简单:“我们这里没设备!”我心想,这还要什么设备,我爸的设备就是两双筷子!

我转身出了社区医院。嗓子眼越来越痛,并不断有液体渗出,不知道是血液还是唾液。我无法吐出来,只能把它们吞咽下去——后来我才明白,卡喉时的吞咽是个无法抗拒的动作。每吞咽一次,我的喉咙都像被刀再扎一次。

在社区医院外滚烫的马路上,我看到我家老头笃笃着拐杖趑趄起地追过来了。他自两年前新冠肺炎住院抢救回来后,就“武装”上拐杖了。我不客气地说:“你来干什么?帮不上忙还得我照顾你!”

我叫了辆滴滴车,带上老头直奔一家三甲医院。途中,老头絮絮地说:“给儿媳打个电话吧。”我儿媳就是这家三甲医院的医生。我说:“她很忙,不要打扰她。”

医院可真大啊,我上上下下地跑,从这科室穿梭到那科室,腿脚不灵的老头不知被我甩到哪里去了。

在口腔科,医生把电子内镜伸进我喉咙里照着,然后断言道:没有异物。我痛苦地咽着唾沫说,我都被卡得要死了,怎么没有异物!这医生又叫另一个医生看了看,同样说没有异物。

口腔科建议我去做CT,做胃镜。这时候,儿媳赶过来了。原来,我老头像呆头鹅一样在楼下东张西望,恰巧儿媳经过,就把我出事的信息传递给她了。

在那长长的CT床上,我被推进去拉出来,颈部平扫,胸部平扫……我极艰难地吞咽着唾液,等待医生“判决”。终于,医生开口道:找到了。

我松了口气,心想把这块该死的骨头取出来,就万事大吉了。医生却严肃地说,

去办理住院手术。我不解地想,取个骨头片子还得住院啊?

儿媳表情严肃,她把检查报告单递给了我。从那些彩图里,我看到那块肇事的骨片斜卡在我的咽部,堵了大半个食道,那个锐角明显扎进了我的食道壁。医生写的诊断文字是:“咽内异物,食管异物穿孔。”

我的食道被戳个窟窿了?

“要在全麻状态下才能做食管异物取出手术。全麻前还得先做身体评估,就是说,看你的身体吃不吃得消。”医生继续说。

于是护士给我量血压、验血,又问我什么药物过敏,还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了些不相干的话,好像在测试我是不是老年痴呆了。我一边艰难地吞咽着口水,一边艰难地回答问题。

血液检验单下来了,谢天谢地,各项指标尚好。我以为这下子可以手术了。但医生又说:“你9点多才吃的早饭,还吃了肉类,要等你胃里食物消化干净了才能手术。”

我的儿子们陆续来了,帮我办了入院手术。进了病房,一位护士拿了个体温计往我耳朵里一插,俏丽地一转身,说:36.1℃。事后我才知道,那些天体温对我非常重要,医生最担心的是我的创口感染。

午后,孩子们都嘱我睡个觉,养精蓄锐迎接下午的手术。可利鲛在喉的难受和痛楚让我坐立不安,哪里还睡得着?我百无聊赖地出了病房,在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。

等待的时间可真漫长啊,我不断地吞咽着唾液,那块骨头就不断地往食道壁里深扎。好不容易捱到下午4点,护士拿来一套手术服让我换上,接着推来一张轮椅,要推我去手术室。我不明白,我好腿好脚的,为什么非要坐轮椅?

在我体重的压力下,轮椅心不甘情不愿地嘎吱嘎吱响,像跛子一样歪歪扭扭地前进。儿子感觉到不对,弯腰一看,原来是

轮椅前面那个小轮子瘪了。我干脆下了车,大踏步地朝前走去。

一行人来到了位于7楼的手术室外,儿媳已换上手术服,要陪我进手术室。我还没来得及看看这手术室长啥样,一针麻醉剂就麻得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事后,儿媳告诉我,那肉骨头嵌顿严重,亏得医生高明,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弄出来。

从麻醉苏醒区出来后,我被推回到病房。儿子把那块从我食道里取出的骨头交给我。我不断地摸着那块粉色的、迷你穿山甲模样的骨头,说不清是后怕还是庆幸。护士又过来量体温,嘱我别吃东西别喝水。

术后的我躺在病床上,喉咙的疼痛并没有减轻,吞咽的频率也没有降低,这让我明白我的创口有多厉害。我并没有喊痛,护士却给我静脉推了一管止痛剂。接着又给我输200毫升的金奥康,那是为了安慰我不能进食的胃;又输500毫升的盐水补液,1000毫升的葡萄糖补充能量……

医生担心我那穿了孔的食管把水和食物漏出去,那叫“奔向纵隔”,要危及生命的。

住院四天,我粒米未进,滴水不沾,全靠各种液体吊着。

每个上午,我的主治医生都要带着一帮人来查房,来了就问:“有没有发烧?”我回答道:“不发烧!”医生不再说点别的,带着人就走了。儿媳告诉我,就怕你发烧,一发烧就是发炎了,就得挂抗生素了……

第四天晚上,我喝了医院提供的一小碗没有一粒米的粥汤,就出院了。回家后,我打开久违的电脑,去网上搜索“骨头卡喉”。我看到不少人因为卡喉伤及动脉出血而死,或创口感染而不治身亡。

不过我的创口恢复得挺快,第五天我就吃半流质食物了;第七天,我就和老头同羹同饭了。只是前几天因艰苦吞咽而累及的舌腭肌和咽腭肌,都过去一个星期了还隐隐作痛。 钱国丹/文 林樱/图

□童年

蒲荇小记

20世纪80年代,零食难得,每当馋意袭来,我就会和小伙伴一起寻美食。春天,我们走进林间,采摘刺泡子;夏日,忙碌的小身影穿梭在果藤瓜架下;秋天,小馋虫们眼巴巴等着荸荠出土。荸荠,台州人叫它“蒲荇”(音),它承载了我童年的满足与欢愉。

秋已暮,露成霜,蒲荇田里一片青黄。秋风拂过,掀起一幅流动的彩色画卷,预示着丰收在即。采收之前还须给田里的水泄尽,待到泥田渐涸,青黄的茎秆渐枯,大人们点一把火将枯枯的茎秆烧个精光,翌日才开始采收。

那时,大伯家种了好多亩蒲荇,丰收时我总能吃上一点(那时即使是自己家的,也不可能让你大快朵颐)。于是,我就会盯着堂哥,每当堂哥扛起小锄头要去蒲荇田里捡漏时,我就会屁颠屁颠地跟上去:“哥,你力气大锄地,我眼力劲好帮你捡蒲荇吧?”“好嘞,你拿着小篮子。”

我提着小篮子连蹦带跳地来到那片被大人们“征战”过的蒲荇田。虽然田块被翻锄得面目全非,可依然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蒲荇的清香,这气息传递着诱人的信息——这里还藏匿着好多漏网之鱼。

王丹华

选好地方,堂哥一锄下去后再来个前捞后

翻,我就睁着铜铃般的眼睛,盯着那一小方泥巴,生怕一个大蒲荇在我眼前溜走。只要我喊一声“这里有一个”,堂哥立马停手,等我捡起蒲荇收入篮子后,他才举起锄头……就这样,他使力,我使眼力劲,配合默契,一两个小时就将小篮子填满了。

我们带着战利品一路欢声笑语,来到小河边,搓洗着蒲荇。没等篮子里的蒲荇全部洗净,个大色艳的几个早被我收入腹中。小河边,小馋虫嚼着蒲荇的倒影与澄澈的河水、和煦的阳光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,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一小篮子蒲荇,勉强能解几天馋。只要那几亩蒲荇田没有被大伯彻底清理干净,我的眼里就只有扛着锄头的堂哥。然而,我曾因蒲荇田里捡漏解馋之举,差点送了小命。

记得那天,我们在蒲荇田里翻找许久也无果,于是,堂哥冒着被大伯责罚的危险,将“战场”移至田埂——蒲荇田小径。

田埂之下的蒲荇真多,堂哥一锄挖下去捞起土块,一个个黑褐色的大圆球扑入眼帘。我激动地大喊:“哇!好多,好大呀!”我捡了一个又一个,一个更比一个大。

堂哥也很高兴,等不及我捡完,继续下锄挖捞。原本捡漏时培养起来的默契,此时已被藏在田埂里的宝贝们破坏了。而被巨大收获冲昏头脑的我眼中只有蒲荇了,捡完眼前的果实,一抬头,我就看到堂哥前面有一个大蒲荇,立即飞将过去拾捡,突然觉得脑门被什么一磕,眼一黑,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待我醒来,已躺在自家床上,头上被白纱布缠着。一旁的奶奶告诉我:“你这个小馋猫,还算命大,小脑瓜才开了一朵小小花。要不是这把小锄头年久生锈,要不是你堂哥反应及时收手,你恐怕再也见不到我咯。”

第二天,堂哥带着一篮子蒲荇和伯母做的蒲荇点心来看我了。我也因此喝了好多天的蒲荇红枣汤,吃了一篮子的蒲荇。真可谓,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。

脑袋因蒲荇开过花,或许有人觉得会留下童年阴影,事实却恰恰相反,我颇感幸运。当聊起童年往事时,我总会对此津津乐道,大家也不免调侃我: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”渐渐地,我就真的相信自己是个有福之人。彼时,因祸得福一饱口福;此时,手摸脑袋幸福地回味着那一片蒲荇田,那一方田埂,那一篮蒲荇。